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清晨的社区花园里，推着婴儿车、操着外地口音的老人，已成为城市一道熟悉的风景。为了支撑起子女在都市奋斗的“大后方”，“老漂”离乡背井，在陌生的城市里重启“育儿生涯”。《银发摆渡人》一书基于大量深度访谈调研，将镜头对准了这一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揭示了“老漂”家庭内部的情感张力与关系智慧。本报记者专访了该书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陈辉。

为什么是“老漂”

记者：您希望读者在合上《银发摆渡人》这本书后，对“老漂”群体乃至我们每个人终将面对的晚年，获得怎样的思考或情感？

陈辉：我写作老漂家庭故事，就是想为人们理解当下的家庭生活提供一个场景，提供一面照见自己生活的镜子，让读者有机会对我们置身事内的琐碎生活有所觉察和反思。

下班后，当我们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中，该如何扮演好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的角色？我们能否关照到父母的心理状态和情感需要？假想当我们多年以后也不得不成为老漂的时候，期待着子女怎样对待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有助于我们经营当下的家庭关系，特别是增强自己“做儿女”的意识。毕竟父母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孝敬父母的好时机。

记者：“摆渡人”的意象，重构了将“老漂”父母付出视为理所当然的认知。在您看来，他们“摆渡”了什么？您希望借此传达一种怎样的代际关系？

陈辉：所有的被爱，一旦习惯了，就容易忽视或忽略，仿佛理所当然。人生如河，家庭是船。城市青年家庭普遍面临育儿难题，特别需要老漂父母撑船摆渡，渡过生命河流中的一个难关。从老漂族角度看，他们不仅摆渡了子女的育儿生活，也在摆渡自己，通过为子女付出，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价值。老漂族的价值意义，充分展现了老龄社会的另一重图景，那就是银发群体在许多领域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借用银发摆渡人这个隐喻，我不仅要展示父母帮忙带孩子这件事对青年家庭发展的特殊意义，还想呈现老漂在子女家生活时的普遍处境，那就是子女关心不够。老人按子女要求带孩子，虽然承担任务很多，但是往往不能做主。摆渡人发挥很大作用，却缺少存在感。这让老漂内心或多或少不平衡，委曲求全，甚至有的憋出病来。也就是说，大多数老漂家庭，代际关系是不平衡的。

记者：在当前社会叙事中，老年人常被视为被关照的“客体”或社会的“失语者”，《银发摆渡人》是在完成一种视角的转换——让他们重新回归生活的“主体”或家庭的“重要资源”？

陈辉：老漂活力满满，比许多年轻人还有精气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使命感，认为帮子女带孩子是自己的人生任务，还想为子女家庭作贡献，发挥生命余热。老龄社会中，老年人还有活力，是重要的人力资源。这是必须正视的。

让老漂族成为老龄叙事中的“主体角色”，除了要肯定老漂是重要的家庭资源，还要关注他们在子女家庭中的处境，关注他们的情感体验和内心需要。我在书中的许多观点和思考，来自老漂的直接讲述。在书中，许多老漂就是自己生命故事的讲述人，这是一种作为“主体”的讲述。

□ 仲伟民

《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的核心问题是重新解释大明“崩盘”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变”，有时变得还非常快。然而，以前，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先人只能服从依顺大自然。除少数城邦或近海小国主要依靠工商贸易生存外，几乎所有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农业。正是因为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力量有限，所以前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稳而不变或稳而小变；如果发生剧烈变化，那一定是外部原因引起的，其中气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气候条件是制约农业发展的最大因素，因此从气候史角度去理解、观察前现代社会的变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将粮价纳入考察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文献指标，是作者卜正民教授的过人之处。他发现，明代中国粮价与气候变化间有密切关系，通过明代价格史与气候史的综合分析，能够窥见明代兴亡的秘密。比较而言，此前历史学者从政治、经济或道德等方面所进行的有关明清易代原因的分析就未免相形见绌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卜教授认为，明朝的灭亡实际上可以视为一场长达两个世纪的生存危机的结束，而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气候变化。

发现物价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没



从故乡到异乡：照亮无数家庭的「老漂」

“老漂”的困境和难题

记者：“落叶归根”的传统与“老漂”的现实，似乎形成了矛盾。他们是如何理解并调和这种情感拉扯的？其中折射出哪些代际扶持与城乡变迁的深层问题？

陈辉：对于老漂来说，到底如何安顿养老生活，确实比较复杂。首要问题是什么时候“落叶”。许多老漂认为自己还没有完成任务，不敢也不愿意“落叶”。是否“归根”，能否“归根”，这些问题都延迟或搁置了。

我调研的老漂，聊起未来养老打算时，想法多样，最普遍的还是想完成任务后回老家。不只是因为老家待着舒服，还因为不想给子女添麻烦。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老漂，更愿意返乡种地养老。这和他们在城里住不惯也有关。相比而言，来自城市的老漂，如果自己有一定经济基础，那么留在子女身边养老的意愿比农村老漂强一点。当然，留在子女身边养老，不仅考验经济条件，还要评估代际关系状态，往往后者更重要。

无论未来养老如何规划，绝大多数老漂都会与家乡保持紧密联系。老家亲戚朋友家中红白喜事，也都尽可能参与。从这个角度看，很多老漂特别是还打算未来返回老家养老的老漂，他们在异乡不是想扎根而扎不下，而是可能就没想扎根，只是想完成阶段性任务返回。这种类型的老漂，在故乡与异乡之间拉扯感就不很强。如果女性老漂的老伴还在老家，或者说老家还有高龄老人需要照顾，就会特别惦记老家。这种类型的老漂，完成任务后大概率返乡养老。

透过老漂族现象，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中，青年异地就业安家背景下家庭抚育功能和养老功能之间的张力。在抚育方面，老年父母成为流动人口，付出较大成本，到异乡帮子女渡过育儿生活难关。在养老方面，子代反哺父母的成本也非常高，特别是两地分居的情况下，子女如何反哺尽孝，确实是许多中年人要考虑和应对的难题。

记者：“老漂”背后也反映出孝道搁置、长辈情感失语等伦理失衡问题。若我们长期忽视他们的付出与情感需求，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

陈辉：在许多老漂家庭中，老漂说自己是免费保姆，甚至有的说自己是带薪保姆，不仅没有工资，还要将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补贴子女生活。这样自嘲，是困于一种角色矛盾中：自己是父母，还是保姆？

如果我们长期忽视老漂的付出和情感需求，可能会有以下几种影响。

第一，影响老漂心理健康。一些老人长期得不到关心和尊重，心理失衡，有了委屈不愿意说或不敢说，这样很容易憋出病来。依据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陵的接诊经验：帮年轻人长期照顾孩子的父母，被诊断出抑郁症的比例很高。

第二，影响家庭中的孝道传承。家庭是孝道传承的重要场所。中年人对待老父母的方式，也在给小孩子作示范。正所谓言传身教。当我们埋怨父母时，儿女跟我们学习埋怨父母。当我们指责父母时，儿女跟我们学习指责父母。当我们尊重和孝敬父母时，儿女跟我们学习尊重和孝敬父母。

第三，影响代际责任伦理。当老人们觉得付出没得到足够尊重和反馈，就会自我怀疑。自我怀疑的人多起来，形成一种舆论，生育养育的意义就会被重新审视。如果人们从养育子女中得不到心理慰藉和价值感，青年人的生育意愿就可能降低。这是更为深刻的影响。

代际共鸣的平衡之道

记者：“老漂”家庭是当前社会竞争的必然产物吗？是否可以理解为，宏现的社会压力正在通过代际支持的方式，向现代家庭生活进行着最终的传导与转嫁？

陈辉：老漂现象根源于青年群体异地立业安家，生育孩子后无力独立应对抚育任务，所以才求助老家父母帮忙解困。为什么很多老漂在孙辈上幼儿园之后，还是不能回老家？因为年轻人依然没法独立应对，需要父母帮忙接送孩子，接送上课外辅导班。

宏观社会压力确实会传导到青年家庭，并通过代际支持这个链条传导给老人，最终形成代际合力应对压力的局面。青年家庭普遍面临双重压力，经济压力和养育压力。经济压力加剧职业竞争，职业竞争压力会加剧养育和教育竞争。反过来说，养育和教育竞争会进一步加剧职业竞争。

需要注意的是，养育教育负担增加，这是现代家庭发展过程中普遍要经历的。我更愿意将老漂族现象，理解为通过代际支持方式应对家庭发展压力的一种机制，这也表现了中国家庭的发展韧性。

记者：当下许多年轻读者自嘲为“三明治一代”，他们在父母、儿女和自己等多重角色之间奔波，却难以达到理想状态。您认为这是一个时间管理问题，还是家庭关系经营意识和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该如何打破这种困局？

陈辉：做父母、做儿女、做自己，我们之所以难以兼顾，主要是因为时间精力、能力和心态的限制。

从时间精力的角度看，年轻人工作忙碌，时间紧张，精力耗损严重。有的人之所以回家之前要在楼下缓一缓，就是不想把工作压力导致的不良情绪带回家中，进门之前完成角色切换。从能力的角度看，家庭生活是要经营的，核心是关系经营。现在年轻人普遍不善于经营关系，我们成长经历中偏重知识学习。如果说时间和精力是客观因素，那么心态是主观因素。我感觉我们对于家庭压力的耐受力，远不如我们的父辈。

从根本上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漂都是在“做父母”的时候顾不上自己的父母，更没法分出足够时间和精力做自己。所以我认为，关键不是时间精力管理问题，而是分配问题，更根本的是活法问题。

要想达成做父母、做儿女、做自己三者关系的新平衡，核心是分出一部分精力“做自己”。当父母表现得积极向上、更好的自己时，就会给子女树立榜样。每一代在兼顾对上赡养和对下抚养的责任伦理时坚持做自己，这样每一代人都有机会活得精彩。当然，做自己的前提是履行基本家庭责任。做自己和自我中心主义有着严格界限。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寻路集》新书分享会。该书作者、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围绕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分享了自己关于中国高速增长的原因、体制机制的影响，以及“三明治”式全球竞争格局等问题的观点，为理解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启发。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周其仁强调了“成本优势”在中国高速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这一优势不是仅指低廉的要素价格，而是“把要素组织起来的整套运行体制的成本”。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大幅降低了体制成本，让低要素成本优势得以在全球市场释放，从而驱动了数十年的经济奇迹。

然而，成本曲线有其规律。周其仁解释，大约在2008年前后，体制成本重新掉头向上，叠加要素价格上升，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他提出的“三明治”竞争格局形象描绘了当前处境：国有发达国家凭借独创新性占据高端，下有后开放国家以更低成本优势紧追，中国被夹在中国，面临“突围”压力。

基于2017年出版的《突围集》的思考，周其仁在《寻路集》中进一步分析了2017年后中国面临的新挑战。他指出，中美关系变化是最大的变局，其深层原因在于长期的“全球不平衡”，这种失衡最终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形式爆发。因此，企业“寻路难”与“行路难”的问题逐渐凸显。

面对复杂变局，周其仁并未停留在宏观分析，而是通过大量一线调研，提炼出企业层面行之有效的三条“寻路”经验。其一，细处求精益求精。在宏观不确定性中，企业可转向内部，通过持续的“精益管理”挖掘潜力。在广东佛山等地调研时，周其仁发现那些提前或适时推行节约节省、消除浪费的企业，即使在困难时期也展现出更强的韧性与竞争力。其二，宽处谋布局。企业应积极“出海”，进行全球网络布局。这不仅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应对贸易壁垒的策略，更是“帮人挣钱”以实现可持续贸易的逻辑。周其仁以美的等企业为例，说明在全球寻找合适生产节点，既能促进当地工业化，也能为中国企业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突破“自我设限”。其三，高处争独到。中国需要更多像大疆这样的原创型企业，从原理、技术到产品进行突破，力争在“三明治”的上层占据一席之地。这也需要将一部分资源从过剩产能领域转向研发与原始创新。在周其仁看来，实践这三条路径还有一个共同的“牛鼻子”：弥补长期以来“市场能力弱于生产能力”的短板。他倡导企业转向“以客户为中心”，用客户视角定义价值、驱动精益、引导创新、规划布局。

“寻路难，行路难”，但出路在于行动与认知的提升。企业应在“精益管理”“全球布局”与“独到创新”中主动寻路，唯有持续深化改革开放，直面现实挑战，并在微观层面积极实践，方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出中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读书单

《鸭绿江来信》
张丁 编著
中华书局
精选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家书56封，其中包含特级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邱少云以及战地作家毛烽、科学家柳支英等21位作者。字里行间，既有对亲人的牵挂，更有“不打败敌人绝不回家”的铮铮誓言。一封封浸透着爱国热血与牺牲精神的家书，既是战争岁月的真实见证，更是家国情怀最生动的诠释。这些家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从抢救民间家书项目8万余封藏品中精心甄选，逾半数内容首次公开披露，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真实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浓浓的爱国情怀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日落落日：缅甸，最长的一战(1941-1945)》
[英]路易士·艾伦 著
朱泓源、杨力明、黄文范、李铁等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七天，日本自缅甸进攻缅甸。当时英军不敌溃退，致中国十万远征军援缅甸失利；日军联合昂山领导“缅甸独立军”攻陷毛淡棉，迅速控制全缅。盟军被迫在雨林、泥泞与疫病中艰困撤退，缅甸的美丽地貌遂成为残忍的杀戮战场。这片被战争烙印的土地见证了20世纪30至40年代军国化日本向西南扩张的极限，及其随之而来的灾难性败北。从1941年的黑暗开端到1945年盟军的疲惫胜利，此战不仅成为英国在“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也深刻影响了参战方的命运。

《糖与现代世界的塑造：种植园、奴隶制与全球化》
[加]伊丽莎白·阿伯特 著
张毛毛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汗青堂

西方对糖的痴迷导致新世界原住民几于灭绝，非洲奴隶贸易兴起。本书挖掘了糖与甜蜜背后血腥的强制劳动之间的联系，描绘了甘蔗种植园的世界，以及影响全世界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详细论述了受奴役者在过去数个世纪经历的残酷生活和所进行的抗争，还揭示了糖是如何塑造世界，并推动经济、贸易与环境变革的，深入探讨了与糖相关的肥胖与糖尿病、环境影响等问题。读者在品尝糖带来的甜蜜同时，见证了全球为满足不断变甜的口味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记者 蔡可心 整理)

大明缘何“崩盘”

有系统物价数据的支撑，同样是水中之月。很显然尽管明代留存的经济史资料足够多，但是物价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卜教授敏锐发现，明代物价整体上是比较稳定的，每当灾荒发生时，各种资料尤其是方志中关于物价的记载就会更多。编撰者记载灾荒时的价格，是因为这些价格是特殊史实，记载这些特殊史实并非为了说明经济状况，而是为了铭记创伤，引人警觉。这些异常的灾荒价格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建立起明朝粮价波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而记载的有关天气现象，如冰雹、蝗灾、龙现、黑瘴、瘟疫、龙卷风、地震、山体滑坡、暴雨等，则为气候史、社会史、疫病史、灾害史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通过对粮价波动与气候变化的比较分析，卜教授发现在诸多气候条件下，气温和降水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大，如果出现其中的任何一种，文献中都会有关于环境危机、饥荒等社会问题的记载。明朝后期出现的历次危机，几乎都与气候变化以及由其引起的物价上涨相关。作者将危机及称为“深渊”，认为明中后期出现了六次“深渊期”，其中万历和崇祯时期的两个“深渊期”影响最大。“万历深渊二期”（1615—1620年），导致女真人的崛起，东北严寒的气候逼迫女真人持续南下，并加强了同明朝的斗争；而“崇祯深渊期”（1638—1644

年）的极端天气，不仅是明朝二百多年中最猛烈的，甚至堪称千年来气候最为恶劣的时期（持续干旱），华北尤其严重。极端的气候变化导致粮食价格腾贵，北方粮价更是南方的10倍以上，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承受的上限。至此，明代的价格体系完全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明王朝的崩溃。入清以后，粮食价格尽管有所回落，但价格区间的底部已经太高，因此清朝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体来说低于明代，这是显而易见的。作者还饶有趣味地说，满人能够统治中国，可能是因为他们更能适应寒冷干燥的气候。上述对明兴亡的解释，无疑比传统解释更有说服力。

将中国历史放在全球史视野中来考察，是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卜教授认为，明代中国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而是与全球有着复杂的联系，这种或主动或被动的联系，对明代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美洲曾经是西班牙重要的布料市场，但由于中国布料价廉物美，从马尼拉远道而来的中国布料，很快就占领了西班牙在美洲的布料市场，每年大约有200亿素的白银从美洲运到马尼拉购买中国布料。那时的中国人工成本低，生产能力强，产品价格低，在世界各地的低端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白银大量流入国内，长期是贸易顺差国。

白银问题是近三十年来全球史及明史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通过白银的全球贸易，论证明代不仅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

且以强大的吸银能力证明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卜教授则认为，从全球背景考察，从美洲运到中国的白银数量有限，即使在对外贸易最活跃的万历年间，运来中国的白银仅占秘鲁矿山开采量的7.5%；绝大部分白银被运往欧洲和其他地方，运到欧洲的白银最多，而其中一部分白银又从欧洲转运到中国。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以及政府购买的特殊体制，使有限流入的白银不足以引起物价的上涨，最多只可能影响到部分商品（如奢侈品）。白银之所以流入中国，一方面当然是中国的商品价廉物美，受到欧美人的欢迎，他们愿意用白银购买；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金银的兑换比例对欧洲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明代金银的兑换比约为1比5，而当时欧洲的兑换比率则约为1比12。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强，黄金在欧洲的购买力强；中国银贵钱贱，欧洲银贱钱贵。在市场价则下，直接导致白银持续不断地进入中国，而黄金则大量从中国流出。因为中国与欧洲之间金银兑换比率长期如此，所以一直到清朝，始终是白银流入，黄金流出。而随着欧美金本位的确立，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及融入全球的能力越来越弱。这些问题尽管本书没有涉及，但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史和全球史是非常有用的。（本文为《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推荐序，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